

# 从大都到上都

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罗新——著

# 从大都到上都

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罗新——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 罗新著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133-2899-9

I. ①从… II. ①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3112号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罗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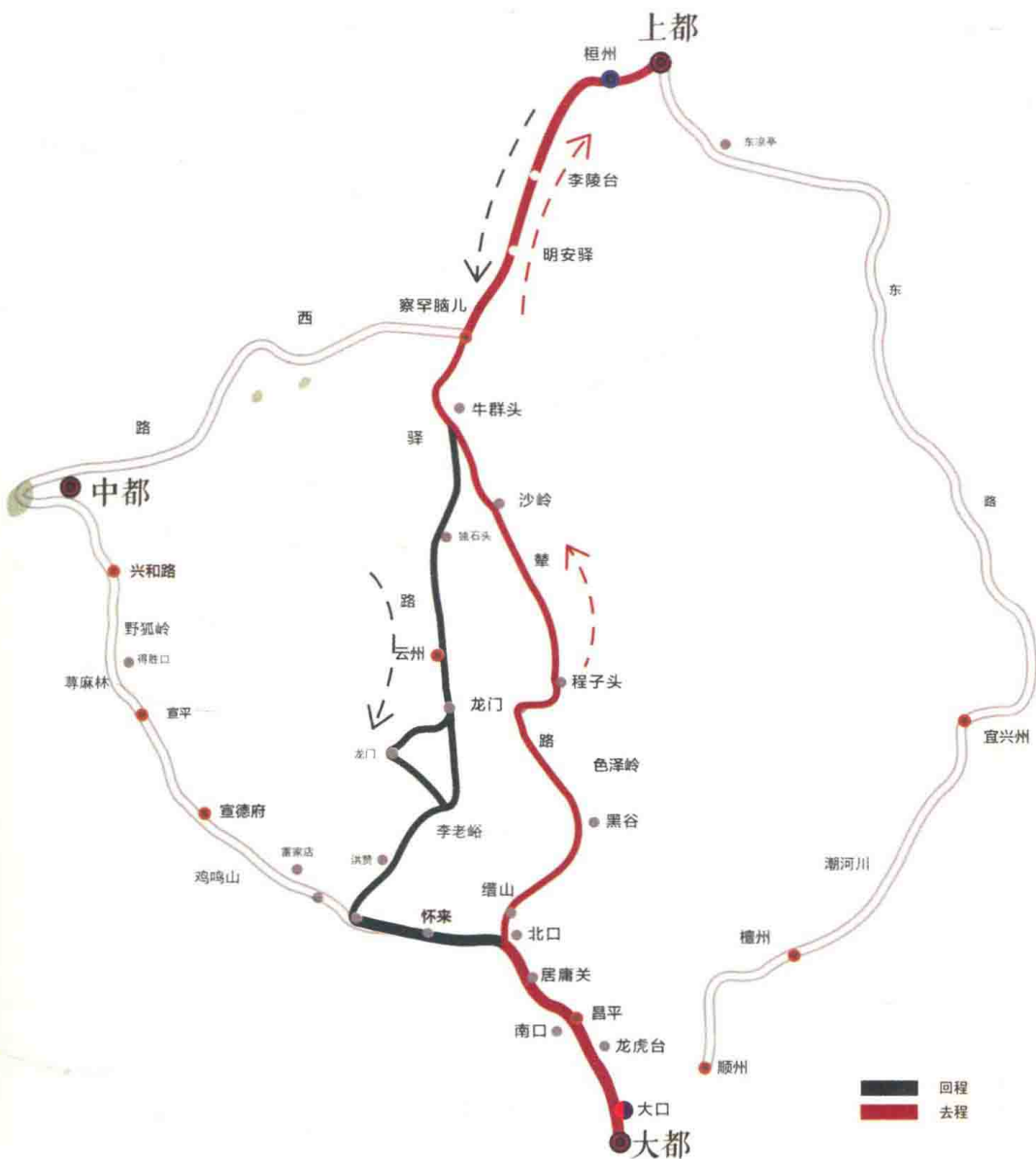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唐琳娜  
装帧设计 周伟伟  
插图绘画 吴黛君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mailto: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920mm×1270mm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899-9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mailto:zhiliang@readinglife.com)

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



上都与大都之间的交通道路共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驿路，两条是辇路。辇路是皇帝所走的专属性道路，往返各走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只有辇路上有捺钵。作者此行所走的是辇路的东道。

此图参考《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一书中地图绘制。

# 目 录

001 | 写在出发之前：金莲川在召唤

023 | 千里滦京第一程

——从健德门到皂甲屯

047 | 龙虎台前暑气深

——从昌平到居庸关

069 | 居庸关外看长城

——从居庸关到延庆

093 | 黑谷深深十八盘

——从延庆旧县镇到白河堡水库

115 | 无限青山锁大边

——从白河堡水库到长伸地村

141 | 边关何处龙门所

——从长伸地村到龙门所镇

165 | 白云依旧照黑河

——从龙门所到白草镇

- 185 | 水远沟深山复山  
——从白草镇到老掌沟
- 209 | 北出沙岭见平川  
——从老掌沟到小厂镇
- 233 | 七月杨花满路飞  
——从小厂镇到五花草甸
- 255 | 梳妆楼下金莲肥  
——从五花草甸到沽源
- 273 | 察罕脑儿草萋萋  
——从沽源到塞北管理区
- 295 | 李陵台上野云低  
——从塞北管理区到黑城子
- 315 | 乌桓城下问白翎  
——从黑城子到四郎城
- 335 | 紫菊金莲绕滦京  
——从四郎城到上都遗址
- 349 | 写在一年以后

写在出发之前：金莲川在召唤



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

我这样回答罗丰。本来说好我会和他一起参加定于六月下旬在撒马尔罕召开的一个有关丝绸之路历史考古的会议，但十天前我确定了新的计划，决定放弃中亚之行，并立即打电话通知远在银川的罗丰。他问我为什么，我说等你来北京见面再详细解释。这就是我的解释，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

那是在蓝旗营的一家咖啡厅。傍晚，成府路如同流速缓慢的汽车水渠，汽笛和马达的喧嚣挤进门窗，似乎是要提醒人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时代。在座的青年朋友惊叹：走去上都！得走多久呀！罗丰一点也不吃惊，大概因为我早就和他说过长距离行走之类的计划，还说过要从北京走到他所在的宁夏。他盯了我一会儿，说，嗯，你的身体可能受不了。我说，是的，可能受不了。他说，可能会受伤。我说，是的，可能会受伤。他问，你还是要走？我答，是的，我还是要走。他说，那么，我支持你。

罗丰是我这一代学者中几乎唯一坚持不说普通话的，他那风味独

特的固原口音在历史和考古学界非常有名，为许多人所乐于模仿。我多年前在无锡举办的一个唐史会议上认识了他，那时我在某场报告中逃出会场，在休息厅闲坐，偶遇还非常年轻、有点腼腆却极有见识的他。固原口音不是障碍，因为他语速不快，言语清晰而稳定。那以后，我一直折服于他的冷静、睿智和博闻多识，而这种罕见的品质与他的固原口音似乎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有一天他忽然改说普通话了，也许他谈话的分量会跟着打些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当听到他用固原口音说“我支持你”时，我立即感觉到温暖和力量，如果他说的是普通话，大概就没有这么可信了。

友谊之于人生，有如同伴之于行旅。

## 2

从大都走到上都。这个念头当然酝酿已久。

十五年前的春天，我在读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一书时，把一些感想贴到“往复”网 BBS 上，向元史专家张帆（金轮法王）请教。虽然那场延续了好几个月的网上论学也留下来一些有意思的成果，比如后来张帆所写的《频婆果考——中国苹果栽培史之一斑》，但多半都是浅尝辄止，其中包括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所谓辇路问题。

我第一次对元帝候鸟一般春去秋来的辇路感兴趣，开始于读朱有燾《元宫词百章》的第十三首：

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

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

“麦秋”见于《礼记·月令》，指四月下旬，小麦将熟之时。初夏天气，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大都北幸开平（上都）。《元宫词》从宫女口中述元代皇宫故事，故有“侍从常向北方游”之句。傅乐淑笺注的重点在“龙虎台”，谓为元代著名捺钵，九月元帝南归大都，百官例得迎銮于此云云。

捺钵，又译为纳拔、纳宝、纳钵、刺钵等，原出契丹语。契丹语与蒙元时代统治集团所使用的蒙古语，虽然同属蒙古语族（Mongolic），但捺钵这个词应该是在契丹语中完成了被赋予皇朝制度意义的语义演化过程，因而为金人所承继，随后又进入蒙古语。《辽史·营卫志》说：“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宋人庞元英在《文昌杂录》里记他接待辽使时问捺钵的意思，使者回答：“是契丹语，犹言行在也。”由此庞元英得出结论说：“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元帝巡行途中的宿顿之所，都是捺钵，比附为汉语的“行在”，是比较贴切、便于理解的。

上都与大都之间的交通道路共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驿路，但皇帝不走驿路，而要走专属性道路，即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的道路，故称辇路。只有辇路上有捺钵。朱有燬《元宫词百章》第四十五首，又有“纳钵南来十八程”句，就是指两都间的辇路，这条辇路上的捺钵共有十八处，曰十八捺钵。傅乐淑《笺注》引元人周伯琦《扈从集》，把十八捺钵之名一一列出，当然准确与否还是有争议的。辇路又有两条，往返各走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此即《扈

从集》所谓“东出西还”。驿路行者较多，记录也多，且前后各时代的继承性较强，因此比较清楚。犂路禁人行走，非扈从皇驾者不能亲行其地，而扈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人更少，这些记录也主要是诗作，不足以反映路线细节，遂造成对犂路的认识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

我在“往复”BBS上和张帆讨论的时候，这个念头就萌生了：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可是不久我就把注意力放到北魏太武帝东巡碑以及由此碑引起的五回道考察中。再以后，时光岂止如梭。走犂路前往上都想的想法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时隐时现。直到最近。

### 3

元代大都的名称，在源自汉语的“大都”之外，还有大概源自畏吾儿（即回鹘，今译维吾尔，Uyghur）语的Khanbaliq，khan是汗，baliq是城市，Khanbaliq就是汗之城，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这个词在《马可·波罗行纪》的各种西文译本里有两种拼写形式，Cambuluc和Kanbalu，所以这两种形式都常见于当时的西文文献。

此外，因为《马可·波罗行纪》采用了蒙古语对中国的称呼Cathay（即契丹，《蒙古秘史》写作“乞塔惕”Kitad，是蒙古语对辽国及后来的金国统治区域的称呼，延伸而至全中国），所以十六世纪从马六甲和菲律宾来到中国的西欧人长时期不知道他们所在的明朝，其实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Cathay，当然更不知道明朝的首都北京就是马可·波罗的汗八里。利玛窦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访问北京时，和来自中亚的穆

斯林突厥人交谈，才知道北京原来就是汗八里。然而，直到 17 世纪末，西欧人所绘的亚洲地图上，大多还是在中国北部或东北部，分出一个国家叫 Cathay，并标出它的首都叫 Cambuluc（汗八里）。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蒙古人只说“大都”“上都”，Khanbaliq 这个词可能并不为蒙古人所用，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蒙古语词汇。如果以蒙古语命名“汗之城”，那应该是 Khan Balagasu 吧。汗八里是包括畏吾儿在内的突厥语（Turkic）和伊朗语（Iranic）各分支语言人群所使用的，他们甚至到明代还用汗八里称呼北京。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沙哈鲁（Shahrukh Mirza）派往明朝谒见永乐皇帝的庞大使团于 1420 年底到达北京，次年回国，记载此事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波斯文原本和后来的突厥文（察合台文）译本，都把北京记作 Khanbaliq，可以算是一个重要证据。当初马可·波罗一行进入蒙古汗廷时，他们的向导和翻译当然出自西域，随后他们在元朝居留期间，身边也应该一直都有翻译，这些翻译大概也都是来自西域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可·波罗没有如蒙古人一样称大都，而是和西域人一样称汗八里。

和大都一样，上都在蒙古语里也没有别的词汇，只有音译。和大都不一样的，则是作为一座都城的上都是骤然出现的，因而在畏吾儿等西域人群里没有另外的命名，只好和蒙古语一样使用“上都”这个汉语词的音译。忽必烈称汗前以金莲川幕府所在地设开平府，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燕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因为滦河上游流经开平城南，上都又获得滦京、滦阳等称呼，多见于诗词，但可能仅限于汉语。然而今日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中，上都的写法是 Xanadu（以及在形式和词义两个方面都略有变化的 Zanadu），虽语源还是汉语的“上都”，读音却已大相径庭（由两个音节变成了三个音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源仍在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的老法文原版把上都音译拼写为 Chandu，是基本忠实于“上都”本来读音的。随着这本奇书流传渐广，马可·波罗对东方世界历史与风物的描述成为文学想象的宝贵资源，上都这座海市蜃楼般的远方都城开始出现在重要的旅行文学作品里。

英国旅行记作家与编撰者珀切斯 (Samuel Purchas, 1577—1626) 首先在 1614 年出版了简本的《珀切斯游记》(*Purchas his Pilgrimes: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Religions observed in all ages and places discovered, 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其中有关上都简介的部分，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但上都的拼写改成了 Xandu，这种改动可以认为是因为从法语进入了英语。珀切斯于 1625 年又出版了二十卷本《珀切斯游记》(*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s, contai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其中第十一卷有对上都的详细描写，继续用 Xandu 拼写上都。《珀切斯游记》所写的上都，虽然号称来自马可·波罗，其实有相当的改写，文学性更强，这使 Xandu 这种拼写形式得以取代老法文《马可·波罗行纪》里的 Chandu 而流行开来。

不过 Xandu 还是距离上都比较近。从 Xandu 到 Xanadu 的发展，要感谢 200 年后一个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他的一篇脍炙人口的诗作。

1797 年英国著名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写出了英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名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收入他出版于 1816 年的一部诗集 (*Christabel, Kubla Khan, and the Pains of Sleep*)。在为这部诗集所写的序言中，柯勒律治描述了他创作此诗的过程。他说，1797 年夏的某一天，正在阅读《珀切斯游记》的他，

因治疗风湿病而服用鸦片酊之后沉沉睡去，在睡梦中进入了书中所记的忽必烈汗建于上都的花园，触景生情，吟诵出不少于二三百行的长诗，醒后追记时，因访客打扰，只记下五十四行，这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甚至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巅峰之作的《忽必烈汗》。在这首诗中，柯勒律治把《珀切斯游记》的 Xandu 写为 Xanadu，不知是出于一种误读还是有意的创制。由于柯勒律治在英国文学史上的盛名及此诗的广泛流行，Xanadu 不仅成为上都的标准译名，而且还具备了桃花源一般的特殊意义。这一语义演化过程，多少类似于香巴拉（Shambhala）向香格里拉（Shangri-la）的发展。

而且，在英语文学传统中，Xanadu（有时候也写成 Zanadu）比 Shangri-la 更有古典气息，因而在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中出现得更频繁。以 Xanadu 为题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非常之多，使用 Xanadu 意象的更是不胜枚举。比如，电影《公民凯恩》里，凯恩的宫殿式庄园就以 Xanadu 为名。再比如，著名旅行作家威廉·达尔瑞坡（William Dalrymple）出版于 1989 年的《在上都——一次追寻》（*In Xanadu: A Quest*），记录二十二岁的他从地中海东岸出发重走马可·波罗之路，直至中国内蒙古的上都，在虚实两个层面借用了 Xanadu 的意象，可说是此书大获成功的因素之一。不只是大众文化，2006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决定把土卫六泰坦星（Titan）上的一个反射光较强的区域命名为上都区（Xanadu Regio），大概就是取其神秘难知的意思。

上都具有多重的意义。

上都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旗政府以东二十公里处。在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兴建开平府之前，这里叫金莲川。金莲川是金世宗命名的。《金史·世宗纪》说金世宗于大定八年五月庚寅（1168年7月6日）下令“改旺国崖曰静宁山，曷里浒东川曰金莲川”。金代皇帝在这一带“清暑”，应该是继承辽代的传统。辽代的夏捺钵常在炭山一带，即《辽史》所谓“清暑炭山”“猎于炭山”“幸炭山清暑”等。炭山又名凉陁、陁头，在今河北沽源县境内，辽人称为王国崖，或写为旺国崖。可见沽源和正蓝旗之间的丘陵山地、河谷草原，正是辽金两代皇帝的驻夏捺钵所在。所以元初的王恽在《中堂事记》里说：“滦野盖金人驻夏金莲凉陁一带，辽人曰王国崖者是也。”

金莲川得名于盛开在河谷草原的金莲花。金莲花并不是莲花，而是一种毛茛科植物，叶圆形似荷叶却小得多，花作喇叭形近似荷花也小得多，花色以黄、橙为主，故得金莲花之名。这种草本植物喜凉耐寒，多生长在 $2^{\circ}\text{C}-15^{\circ}\text{C}$ 的湿润环境。乾隆年间由金志章、黄可润先后修纂的《口北三厅志》有这么一段描述：“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这里说金莲花“七瓣环绕其心”，正是内蒙东部金莲花的特色，其他地方的金莲花花瓣较多，多至10—20片不等。金莲川一带的金莲花，花瓣较少，常见6—8片者。故《口北三厅志》概言而称七瓣。

我七年前的夏天到上都遗址，特别留意金莲花。上午看还包着花蕾，下午全都绽放，原野上金光耀眼，在湛蓝的天空下格外明亮，令人不由不想象当年满川黄色的动人景象。元好问有诗云：“灿灿黄金华，

罗生蒿艾丛。野人不知贵，幽香散秋风。”黄金华，就是金莲花。元好问写的是五台山的金莲花，论川野之平敞辽阔，那是远远不及金莲川的。元人周伯琦《扈从集》云：“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人。草多异花，五色。有名金莲者，绝似荷花，而黄，尤异。”金代的赵秉文有诗云：“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然而我在上都看见的，更多的是大呼小叫的游客、喷着热气的大巴和飞奔来去的小汽车，以及为了游客而陈设的瘦马和骆驼。如果闭上眼睛，把这些你不想看见的都代之以牛车和羊群，以及骑马长歌的牧人，是不是就等于看见了往昔呢？元代萨都刺有描写上都的诗句：“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

元代蒙古语里如何称呼金莲川？

传说元朝的亡国之君元顺帝妥欢帖睦尔（Toghon Temür，1320—1370）北逃以后，痛心大都与上都之不守，写下一首沉痛伤感的蒙古文长诗，见载于17世纪编纂的蒙古文史书《黄金史纲》和《蒙古源流》等，各书所载颇有异同。当然研究者并不相信这真是元顺帝所写的，但可能是时代并不晚的作品。这首诗的不同版本有两种较好的汉文译本，前者是朱风 and 贾敬颜的译本，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后者是乌兰的译本，见《〈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两种版本的蒙古文原文都提到上都的 Shira Tala（黄色的原野），即金莲川。乌兰说，今上都遗址一带的草滩仍称 Shira Tala，因为长满了一种名为 Shira checheg 的花。Shira checheg 就是“黄色的花”，也就是金莲花。可见元代蒙古语是用 Shira Tala 称呼金莲川的，即托名元顺帝的那首诗里所说的“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走去上都，就是走向金莲川。